

“菲利普斯曲线”存疑： 对通胀与失业关系的再讨论

桑 瑜

内容提要: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政府提出既要守住稳增长与保就业的“下限”,同时又要把握防控通胀的“上限”。怎样处理好保就业与控通胀的关系,有学者根据“菲利普斯曲线”主张为了保就业应推高通胀。本文认为,萨缪尔森与索洛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上并不成立。本文在梳理“菲利普斯曲线”缘起和流变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重点分析了工资与成本、成本与价格、价格与通胀的传导机理,从三个层面指出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失误,并用中美两国的相关数据作了实证。本文指出,中国要达到扩大就业与防范通胀的双重目标,应在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重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关键词:菲利普斯曲线 工资变动率 通胀率 失业率

作者简介:桑瑜,中共中央党校副研究员、博士,100091。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7)09-0146-13

一、引 言

当前全球经济出现衰退,中国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为应对复杂局面中央提出了新的宏观调控思路,强调既要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同时又要把握好防控通胀的“上限”。怎样处理好就业与通胀的关系?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要保就业就得以推高通胀为代价。此观点的理论依据无疑是“菲利普斯曲线”。而本文认为,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菲利普斯曲线”本身在理论上存在诸多疑点,并且也与现实情况不符。本文将从“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渊源及其流变入手,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指出该曲线的理论失误与缺陷,并运用中美等相关国家的数据予以实证。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实际,对现阶段如何保就业与防通胀作进一步的讨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渊源、流变及其评述

从理论源头追溯,“菲利普斯曲线”发端于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Phillips,1958)在《经济学》杂志发表的《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在这篇论文

中,菲利普斯根据英国 1861—1957 年近一百年的统计数据,提出了一条反映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而当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甚至可能为负。由此他得出结论:名义工资率变动是失业率的递减函数。而菲利普斯的同事理查德·利普西对这条曲线进行了理论解释,他根据自己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指出是由于市场存在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不仅使得失业率下降,而且拉动了货币工资率上升。这条“失业—工资”曲线就是最初的菲利普斯曲线。

需要指出的是,菲利普斯本人提出的这条曲线描述的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经验事实,其解释力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机器自动化程度,不过尽管如此,很多机械设备仍离不开人工操作,加之伴随欧洲大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兴起,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正如菲利普斯的同事理查德·利普西所说,当时工资率上升表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升,而企业用工增加,失业率自然会下降。然而这只是反映了那一特定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事实上,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欧洲经济增长的减缓,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弱;同时“机器人革命”进一步推动了智能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于是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再有刚性,很多生产领域的企业开始“用机器换人”。这样虽然工资率上升,但失业率反而居高不下,对这一现象,“菲利普斯曲线”显然无法解释。

本文认为,关于失业与工资的关系马克思的研究更深刻、更科学。其核心观点是:第一,资本不断积累必然导致失业。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①,并且推断:“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②这是说,相对过剩人口(失业)是资本不断积累的必然产物。第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决定了失业率与工资率的变化。马克思说:资本是不断增殖的价值,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会不断采用新技术设备,资本技术构成会不断提高。而“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像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③。这里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工资率下降与失业率上升,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对劳动需求减少的结果。事实上,我们也可用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解释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后出现的工资率与失业率双上升的现象,原因是,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后人力资本报酬急剧上升导致工资率上升,而由于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令资本有机构成继续提高而导致失业率上升。

1960 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与罗伯特·索洛(Samuelson 和 Solow, 1960)合作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关于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一文,他们以菲利普斯的研究作基础,用美国的数据替换英国的数据,用通货膨胀率替换工资增长率,将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关系延伸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并将这条曲线正式命名为“菲利普斯曲线”(也称“失业—物价”曲线)。其含义是: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率就越低;反之通货膨胀率越低,失业率则越高。在萨缪尔森和索洛看来,曲线上的每一个点都可以解释为一种可能的经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91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707 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90 页。

济政策方案,因此政府在调控经济时,面对的是一张“在不同程度的失业和价格稳定性之间进行选择的菜单”,政府可以用较高的失业“购买”较低的通货膨胀,或者用较高的通胀“购买”较低的失业。

经过萨缪尔森与索洛的修正,“失业—物价曲线”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然而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滞胀”,即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菲利普斯曲线”因此而受到了挑战。对此货币主义学派引入了“自然失业率”和“适应性预期”理论来加以挽救,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是成立的,但长期而言,由于人们可以不断修改自己的通货膨胀预期,因此“菲利普斯曲线”会变成一条从自然失业率出发的垂线。与货币学派观点相同,新凯恩斯主义也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可以反映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反向关系,长期来看市场的调节作用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就没有交替关系。而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无论长期或短期,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通货膨胀率总是一致的,比如卢卡斯指出,通货膨胀率预期是由理性的经济主体所形成的,虽然经济主体在形成预期时会犯错误,但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即经济主体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不会一直过高或过低,这样也就无法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或通过增加失业人口来治理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始终是一条从自然失业率出发的垂线。对于学界的争议,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有这样的评论:“实质上已经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再相信最初提出的天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了。目前这项争论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即任何人都同意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比短期的倾斜度更大,唯一的问题是,它是垂直的,还是不那么垂直。这方面的事实尚不很清楚。”

在萨缪尔森与索洛之后,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Okun,1962)利用美国 1947—1960 年季度数据,又研究了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并于 1962 年提出了所谓的“奥肯法则”,即当实际 GDP 增长相对于潜在 GDP 增长下降 3.2% 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 GDP 增长相对于潜在 GDP 增长上升 3.2% 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借助这条法则,奥肯以经济增长率代替了通胀率,提出了第三种“菲利普斯曲线”即“产出一失业”曲线。在这条曲线上,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具有对应的反向变动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

奥肯提出的这条“菲利普斯曲线”,其实只是对美国经济数据的简单概括,既缺乏理论上的论证,也经不住实践的检验。从全球范围看,目前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奥肯悖论”现象。以我国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1 世纪初,我国 GDP 增长率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8% 左右上升到 10% 以上,而同期失业率也从 3.1% 上升到平均 4.2%;可近年来 GDP 增速与失业率则出现了同步下降趋势,2010 年 GDP 增速为 10.3%,2015 年下降到 6.9%,可同期失业率一直稳定在 4.1% 左右,2015 年降到近 8 年来的最低水平 4.05%。即使在美国,奥肯法则也同样失灵。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1 年美国 GDP 增长率为 1.09%,此后四年逐步上升,到 2004 年达 3.59%,而同期失业率却从 2001 年的 4.7% 上升到 2004 年的 5.5%。这表明,基于奥肯法则的“菲利普斯曲线”在实践中并不存在。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过研究。比如 Akerlof(2000)等针对理性预期学派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质疑,提出了“近似理性行为假设”,认为在低通货膨胀率时,人们存在货币幻觉而忽略通胀率的影响,经济可以维持比零通胀率更低的失业率;而当通胀率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忽略通胀率的成本将增加,人们会把通胀率考虑在内,形成理性行为,这个转折点的通胀率就是最小化失业率的通胀率。Clark 等(1995)对美国 1964—1990 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

现菲利普斯曲线是非线性的,即失业率与通胀率并不存在确定的反向关系。国内学者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上,比如茅于軾(1996)通过对1985—1994年我国通胀率和失业率的数据分析,认为通货膨胀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放缓经济发展,因而也不会带来失业率的下降。厉格非、王锦功(1999)通过对1964—1992年美英两国失业率和通胀率进行归纳分析发现,64.8%的年份存在负相关关系,不相关年份仅占8.2%,由此推导出菲利普斯曲线是存在的,只是实际中表现可能不稳定。张焕明(2003)通过对我国1979—2000年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在短期内,治理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对失业率没有影响,即菲利普斯曲线为垂直于X轴的直线;而从长期看,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是负相关的。刘金全、金春雨、郑挺国(2006)采用具有区制转移的状态空间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中国“产出一价格”关系具有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性质。赵伟、萧月华(2007)等利用我国1979—2003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了菲利普斯曲线的走向特点和原因。彭新、彭丽(2011)通过研究我国1999—2009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得出菲利普斯曲线在经济危机的特定时期适用于中国这一结论。郑挺国等(2012)从实时分析的视角,构建了四类预测模型对我国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测,研究得出“产出一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通胀实时预测中并不适用。徐海(2013)利用我国1985—2011年的宏观数据对通胀率与失业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验证了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只是阶段性适用。本文认为,目前学界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质疑不无道理,可遗憾的是虽然分析角度与原因解释各有侧重,但都没有切中要害。为何得出这样的判断?接下来本文将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作重点讨论。

三、用“通胀率”替代“工资率”:菲利普斯曲线的三大疑点

前面梳理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缘起和流变,现在我们对学界流行的“物价—失业曲线”进行讨论。萨缪尔森与索洛用通胀率替换菲利普斯提出的工资变动率,这样原来“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工资率与失业率的关系就变成了通胀率与失业率的关系。对为何要做这种替换,萨缪尔森和索洛给出的理由是,工资是成本的重要构成,工资上涨则成本会增加,而价格等于成本加利润,故工资上涨必导致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又必引发通胀。从表面看,用通胀率代替工资变动率似乎无懈可击,但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一替代在理论上至少有三大疑点。

(一)工资上涨不一定导致成本上升

讨论工资与成本的关系,应以单个产品为研究对象;从单位产品的成本构成看,工资无疑是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占到了企业总成本的50%。也许正因为此,萨缪尔森和索洛认为一旦工资率上涨,必推高企业成本。本文认为,这一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从单位产品看,工资上涨最终是否加大成本,关键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如果工资上涨而劳动生产率不变,单位产品成本当然会增加;但如果工资上升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也上升,则单位产品成本未必会增加。

马克思曾对劳动生产率与单位产品成本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论述。他指出,“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小,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①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54页。

且他还说,“我们所理解的劳动生产力增加,是指使用一定量劳动时具有更大的效率,而不是指使用的劳动的量的任何变化。”^①在这里,“劳动生产力”其实就是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凝结在单位商品中的价值量减少,单位商品的成本也就降低了。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假定某企业每天生产 100 件衬衣,每天的工资成本为 1000 元,非工资成本也为 1000 元,那么一件衬衣的平均成本为 20 元;现在再假定市场上劳动力供不应求,工资水平提高,每天的工资成本涨到 1500 元,如果劳动生产率不变,这样一件衬衣的平均成本就上升到 25 元,比原先增加了 5 元。可见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工资上涨的确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可如果工资上涨而劳动生产率同时上升,情况就不同了。假设工资水平提高后,每天的工资成本从 1000 元涨到了 1500 元,而劳动生产率也同时提高了一倍,即一天可生产 200 件衬衣,这样加上非工资成本 1000 元,一件衬衣的平均成本就只有 12.5 元,比之前的 20 元还降低了 7.5 元。这就表明,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即使工资上涨,企业成本也不一定增加,反而可能会降低。

(二)成本上升不一定导致价格上涨

从价格构成来看,价格等于成本加利润。于是萨缪尔森和索洛进一步推定,成本增加必导致价格上涨。可事实上,成本与价格的关系也并非如此,价格虽然包含成本,但决定价格的因素未必就是成本。

从不同的市场主体看:商品价格可分为生产者的卖价、消费者的买价以及由供求双方共同决定的市场价。所谓卖价,是指企业按照生产成本加利润确定的价格;而买价则是消费者根据自身需求确定的价格;市场价指的是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共同确定的价格。这是说,无论卖价还是买价,不过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单方出价,能否成为市场价,最终取决于商品的供求状况。

让我们来看马克思是怎样分析成本与价格的。首先,马克思认为是市场需求直接调节市场价值或生产价格。他指出,不同生产部门的商品是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来出售的。在一般情况下,市场价值“是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门的产品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②但是,在特殊的组合下,那些在最坏条件下或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也有可能调节市场价值,而这种市场价值又必然地成为市场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一般规律是,“如果需求非常强烈,以致当价格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也不会降低,那么,这种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决定市场价值。”^③

这是一方面,同时马克思还认为需求也可调节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的背离。他分析说,如果需求量和供给量不一致,市场价格就会偏离市场价值。两者之间的差额越大,市场价格偏离市场价值就越远,或者更高于市场价值或者更低于市场价值。这是因为如果“需求超过了供给,那么,在一定的限度内,一个买者就会比另一个买者出更高的价钱,这样就使这种商品对全体买者来说都昂贵起来,提高到市场价值以上;另一方面,卖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按照高昂的市场价格出售。”^④

从马克思的以上分析中,可归纳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当商品供不应求时,商品定价由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7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9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0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16 页。

者主导,这时成本可以决定价格,卖价就是市价。比如一台黑白电视机的成本为100元,目标利润为20元,那么生产企业给黑白电视机的定价就是120元,市场交易价也就是120元。第二,如果商品供过于求,定价则由消费者主导,即需求决定价格,这时卖价也就不可能成为市价。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目前彩色电视供过于求,其价格就不是由厂家决定而是由消费者决定。尽管近年来市场上钢材、工程塑料、彩管等彩电生产的原材料纷纷涨价,有的涨幅高达20%至30%,彩电生产成本明显增加,但同期彩电的价格却一直下跌。由此可见,在供过于求的市场条件下,决定价格的是需求而非成本,如果需求减少,即使成本上升价格也不一定上涨。

(三)价格上涨不一定导致通胀率上升

萨缪尔森和索洛认为,工资上涨将推高物价,从而导致通胀率上升。本文认为这种推断也是错的。所谓通胀,是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而通货贬值的现象。比如1992—1994年,我国农产品、工业品等各种商品的价格普遍上扬,导致货币购买力下降(贬值),CPI从1992年的6.4%上升到1994年的24.1%,这种现象就属于通胀。要指出的是,通胀虽然表现为商品价格上涨,但价格上涨并不一定导致通胀。再比如2015年我国的猪肉、蔬菜等农产品价格比2014年明显上涨,可全年CPI只有1.4%,比2014年的2%还降低了0.6个百分点。

关于通胀发生的机理与原因,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1911年在《货币的购买力:其决定因素及其与信贷、利息和危机的关系》一书中曾有深入的分析。他指出,买方支出的货币总额总是等于卖方收入的货币总额,并据此提出了现金交易方程式: $MV=TP$ 。其中M代表货币供应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社会交易量。在一定时期V与T相对稳定,可以看作常数;而M由货币管理当局控制,P反映价格变化,于是M与P的关系可以描述为 $P=M(V/T)$,即在货币流通速度与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物价水平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如果货币发行量增加即提高M,则物价水平P必然要提高。正因为此,后来弗里德曼也很肯定地说,“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量比产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

虽然费雪与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对的,但他们并未揭示通胀的终极原因。对此,本文认为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分析更有说服力。马克思说:“商品在金上的表现——X量商品A=y量货币商品——是商品的货币形式或它的价格。”^①这句话的意思,通俗地讲就是在金币流通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自身的价值和货币商品金的价值。如果商品的价值量不变,金的价值量下降,商品的价格就会相应地上升,货币(金)的数量也会增加,通胀就会发生。在揭示金属货币流通规律后,马克思又进一步阐述了纸币流通的一般规律: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用符号表示就是: $PY=MV$ 。如果Y和V不变,M的数量就会随着金价值量的下降而增加,价格P则相应的上升。

以上分析显然与货币数量论不同,马克思认为,“流通手段量的变化是由货币本身引起的,而不是由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是由它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引起的。先是商品价格同货币价值成反比例地变化,然后是流通手段量同商品价格成正比例地变化。”^②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阐明了生产价格、货币价值与价格水平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价格水平变动的客观规律。

对通货膨胀为何是由货币供应过多引起而不是由成本上升引起,我们可用一个简化的模型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7页。

证。假定市场上只有大米和服装两种商品,1吨大米总价为10000元,100件服装总价也为10000元,央行投放的货币正好为20000元,这样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大米与服装的相对价格可能出现变动但通胀不会发生,因为只要货币总量保持不变,1吨大米涨到15000元,100件服装就得降价为5000元,否则没有对应的货币需求,衣服只能压库。可如果这时1吨大米涨到了15000元,100件服装也涨到了15000元,毫无疑问一定是央行发行的货币增加了10000元。

以上三个层面的分析表明,工资上涨不一定推动成本上升,成本上升不一定导致价格上涨,价格上涨不一定引发通货膨胀。从这三个层面的逻辑关系来看,绝不可武断地用通胀率替换工资变动率。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萨缪尔森和索洛修正后的菲利普斯曲线存在明显的缺陷,它所揭示的通胀率与失业率的反向变动关系并不成立。

四、对“菲利普斯曲线”的重新实证

国内外学者对“菲利普斯曲线”都进行过实证,特别是国内不少学者利用我国不同时段的数据,对通胀率与失业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但本文认为,由于对我国样本数据的选取年限较短,目前的实证研究对于分析失业与通胀关系的长期走向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鉴于此,本文将以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的长期数据为样本再进行实证,以此证明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负相关关系,即使在某些经济发展阶段二者此消彼长,也只是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或者说只是数据上的巧合而已。

(一)美国失业率与通胀率的关系。

纵观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可以发现近六十年来,美国失业率与通胀率的联系是随机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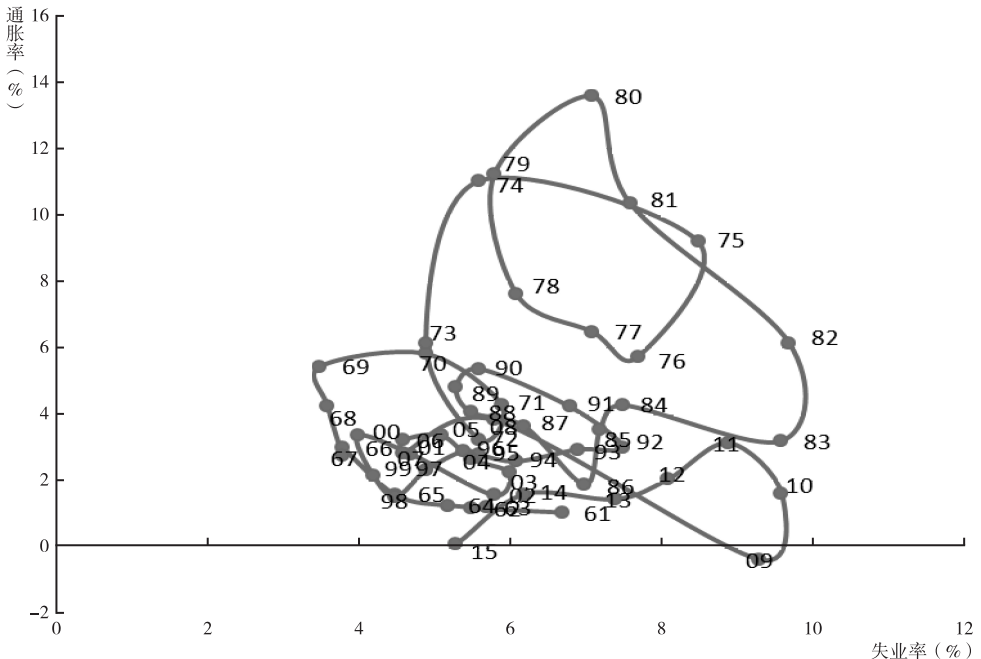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1960—2015年失业率与通胀率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s://www.bls.gov/>。

比较明显的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并存。1970年通胀率为5.84%,失业率为4.9%;1973年通胀率上升到6.16%,失业率仍保持在4.9%;到1974年通胀率高达11.03%,而失业率也升至5.6%,通胀率与失业率出现了“双升”态势;到1979年通胀率更是飙升到了11.22%,而失业率同样也保持在5.8%的高位。

进入80年代之后,美国的通胀率与失业率又出现了“双降”局面。1980年通胀率为13.58%,失业率为7.1%;1984年通胀率降到了4.3%,失业率为7.5%;1985年通胀率下降为3.55%,失业率降为7.2%;1986年通胀率只有1.91%,而失业率也继续下降到7.0%;1987年通胀率稍有回升到3.6%,失业率降为6.2%。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美国的通胀率与失业率相对比较稳定,通胀率在3%左右浮动,失业率则保持在5%上下。

但从图1中也可以发现,20世纪60年代美国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可以拟合出一条近似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双曲线。数据显示(见表1),1961—1969年间美国失业率与通胀率的确存在明显的反比关系。1961年通胀率为1.07%,此后逐年攀升且增长越来越快,到1969年高达5.46%,增长了4.39个百分点;而失业率则从1961年的6.7%逐年下降,到1969年跌至3.5%。

表1 美国1961—1969年失业率与通胀率对比 单位:%

年份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通胀率	1.07	1.20	1.24	1.28	1.59	3.01	2.78	4.27	5.46
失业率	6.7	5.5	5.7	5.2	4.5	3.8	3.8	3.6	3.5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s://www.bls.gov/>。

但进一步研究表明,出现这种情况只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越战争升级,导致联邦政府的军费开支巨额增加,美联储为阻止利率上涨,不断提高货币供给增长率,扩大货币发行,结果导致物价水平上涨,通胀严重。而与此同时,美国为加速经济增长保持霸主地位,又实施了扩张性财政政策,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减税。1964年2月约翰逊总统签署《1964年税收法案》,边际税率从《1954年税收法案》中20%~91%的范围下降到14%~70%的范围,公司所得税率从52%降到48%,降税额相当于当年收入水平的30亿美元。1964年的减税是美国历史上截至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行动,有效扩大了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了就业的增长,仅1965年一年就创造了68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

由此可见,虽然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高通胀与低失业并存的现象,但低失业并不是政府用高通胀换来的,而是得益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大规模大幅度减税促进了就业增长。因此这一时期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纯属数据上的巧合。

(二)中国失业率与通胀率的关系。

根据我国1980—2015年的统计数据,可以得出失业率与通胀率的对应关系图(见图2)。如图所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从20世纪80年代数据来看,1980—1983年通胀率与失业率同时呈下降趋势。1980年我国通胀率为7.5%,失业率为4.9%;1981年通胀率下降了5个百分点至2.5%,失业率也降为3.8%;1982年通胀率继续下降到2.0%,失业率也同步下降0.6个百分点至3.2%;1983年通胀率保持在2%,失业率继续下降0.9个百分点跌至2.3%。1984—1989年,失业率一直稳定在2%左右,但通胀率持续上升,1984年为2.7%,1985年跃升至9.3%,1988、1989两年均超过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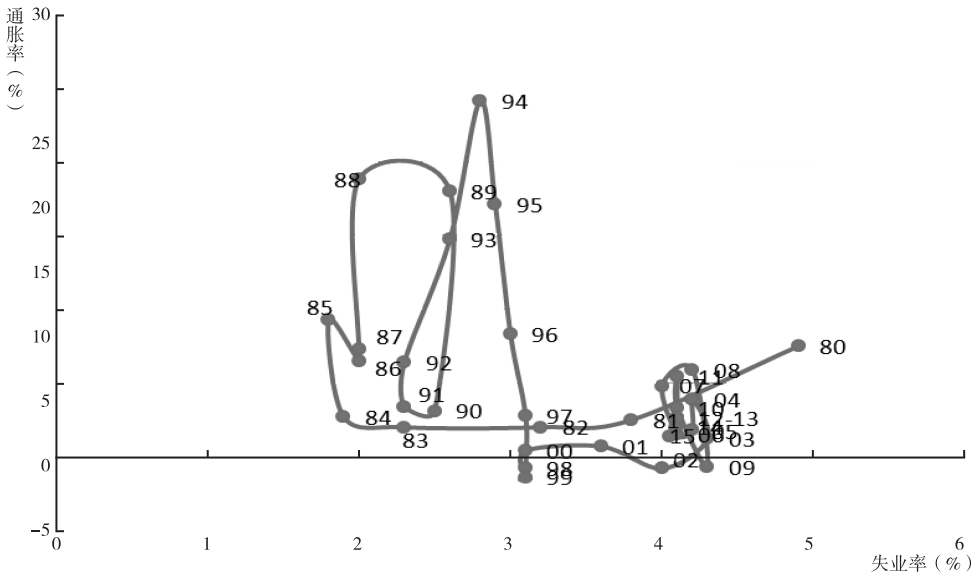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1980—2015年失业率与通胀率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通胀率(CPI)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失业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2月)。

90年代之后,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联系仍然是随机的。比如1998—2000年,失业率始终保持在3%,而通胀率从-0.8%降至-1.4%,再上升到0.4%。进入21世纪以后,近十多年来失业率一直稳定在4.2%左右,而通胀率波动较大,2001年为0.7%,2002年为-0.8%,2004年上升到3.9%,2007年继续升至4.8%,2008年达5.9%。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又呈现出低失业与低通胀并存的态势。2010—2013年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1%,2014—2015两年稳中有降,分别为4.09%和4.05%;而与此同时通胀率也呈逐年下降趋势,2011年为5.4%,2012—2013年降到了2.6%,2014年为2.0%,2015年仅为1.4%。

但从表2中可以看出,1994—1997年间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这期间通胀率逐年下降,从1994年的24.1%降低到1997年的2.8%;而失业率则逐年攀升,每年上涨1个百分点,从1994年的2.8%增加到1997年的3.1%。

表2 中国1994—1997年失业率与通胀率对比 单位:%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通胀率	24.10	17.10	8.30	2.80
失业率	2.8	2.9	3.0	3.1

资料来源:通胀率(CPI)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失业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2月)。

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出现的高通胀是货币供给增加的结果。从1990年开始,我国货币供给量连续五年保持高速增长,1990年M2增长率比1989年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1993年M2增长率达到顶峰37.3%(见表3)。根据弗里德曼的理论,货币数量变动对物价的影响有12~18个月的“时滞期”,因此到1994年通胀率也从1990年的3.1%跃升到24.10%,成为改革开放以来

历史最高值。此后随着央行对货币发行量的控制,从1994年起M2开始逐步收缩,1995年M2增长率较前一年降低了5个百分点,到1996年M2增长率下降到25.3%,1997年通胀率回落至2.8%。

表3 1989—1996年我国货币供应量及年增长率

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M2(万亿元)	1.08	1.53	1.93	2.54	3.49	4.69	6.07	7.61
年增长率(%)	18.3	28.0	26.5	31.3	37.3	34.5	29.5	25.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

而与此同时,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从政策调整阶段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1993年中央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4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随即国企开始了大规模的减员增效与下岗分流。据统计,1994年下岗职工人数为360万人,1995年为564万人,1996年达890万人,1997年则上升到1400万人,由于下岗失业人口的激增,失业率逐年递增。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出现的失业高峰并不是因为低通胀,而是深化国企改革必然付出的代价。

五、对当前我国保就业与防通胀的建议

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45%降为2016年的6.7%。经济下行给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从就业总量来看,虽然我国劳动力总量在不断减少,但进入市场的劳动力数量并没减少,加上近两年来高校毕业生数量都超过700万,整体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从就业结构上看,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去产能,劳动力供求结构出现了明显失衡。一方面,高新技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需求量大,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83%的企业的技术人才需求集中在制造业,但对应的人才供给却明显短缺;另一方面,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可能出现规模失业风险,许多企业的职工和大量农民工面临下岗再就业的困境。民革中央的调查数据显示,预计近几年有将近1000万劳动力需要转移。这表明,当前我国就业问题面临新矛盾和新挑战,不容乐观。

而从通胀情况来看,近几年我国持续处于低通胀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通胀率为5.4%,2012、2013年均为2.6%,2014年为2.0%,2015年为1.4%,2016年为2%。但与此同时,金融市场也存在一定的潜在金融风险,突出的表现是杠杆率迅速上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我国整体债务规模占GDP之比达到249%,政府债务占GDP之比为44%,若将政府的或有债务包含在内,政府债务占GDP总规模约为64%;居民部门负债占GDP比重为39.9%;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总额占GDP比重为156.1%。高杠杆不仅不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还导致银行风控压力加大,容易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根据银监会统计,2015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额达1.25万亿元,较2014年末增加近48.6%;不良贷款率达1.65%,较2014年末上升0.43个百分点。特别是2015年以来汇市、股市也出现剧烈震荡,票据市场、P2P网贷等影子银行风险也相继暴露,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综合来看,对照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CPI控制在3%左右”的目标,通胀似乎还存在

一定空间。于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下可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推高通胀来促进就业增长。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前面的研究已经表明,失业与通胀之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因此政府在调控经济时并非只能用较高的通胀换取较低的失业;二是从我国的实际来看,近年来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这也充分表明扩大就业并不必然以推高通胀为代价。

对如何防通胀,本文认为,当前应该继续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政府要控制通胀,关键在于控制货币供应量。鉴于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面临的严峻挑战,央行首先要控制基础货币(M2)的投放增长不得超过12%;同时还应通过直接控制贷款额度、贷存比例以及提高资本金要求等控制好贷款增长规模;另外,为了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防风险”的作用,还可更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和抵押补充贷款(PSL)等数量手段对短期流动性进行预调和微调。

对如何促进就业,本文认为绝不可用推高通胀的办法,而应立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我国就业压力虽然有供求总量失衡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由结构性问题引起的,因此治本之策是深化结构改革。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求我们从生产端入手,有效地化解产能过剩,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中央讲得很清楚,供给侧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要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目标,关键是要通过改革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让市场在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为此,政府应特别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紧密配合,相互助力,重点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在“去产能”方面,央行一定要有定力,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态势。对需要严控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和产能过剩产业,银行不能继续增加贷款支持,否则会令那些本应淘汰的产能(企业)继续苟延残喘,甚至死灰复燃。特别是对“僵尸企业”,银行更不可再扶持。数据显示,目前A股市场上共有200多家“僵尸”企业,包括以钢铁、有色、造纸、纺织、船舶、石化、化工、机械、水泥、煤炭等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公司,这些企业效益不佳,长期亏损,主要依靠银行支持和政府扶持勉强生存,有的已完全失去清偿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对“僵尸企业”银行要坚决压缩和退出相关贷款,避免金融资源的浪费。

第二,在“去杠杆”方面,货币政策要善于做好“减法”,防治出现通胀和金融风险。通常而言,降低杠杆率有两条途径,一是提高经济增速,让GDP的增长速度超过债务增长以做大分母;二是通过债务偿还、债务减记、债务转换等方式缩小分子。目前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显然不可取,最直接的办法是降低负债水平。一方面可以在偿还旧债的同时减少新债发行,或由政府或央行承接债务,进行债务减记;另一方面可以进行债转股,将债权转变为股权,通过改善企业的股东结构和治理结构,最终提高资产端的资金使用效益。同时还应对配资私募的金融衍生品进行清理整顿,目前场外衍生品市场存在巨大的风险,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式的破坏,不仅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也极易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加剧工人下岗失业。

第三,在“补短板”方面,货币政策要配合财政政策有选择性地做好“加法”,发挥好雪中送炭的作用。应鼓励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向市场需求强烈而有效供给不足的产业,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等领域的信贷支持,继续完

善民生金融,支持就业、扶贫、助学等民生工程,并配合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做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和服务,通过加大对短板领域的金融支持,不断优化银行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1. 厉格非、王锦功:《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探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
2. 刘金全、金春雨、郑挺国:《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动态性与通货膨胀预期的轨迹:基于状态空间区制转移模型的研究》,《世界经济》2006年第6期。
3. [美]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朱善利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8~59、124~125、153页。
4. 茅于軾:《也说通胀和失业》,《改革》1996年第2期。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0~691、70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54、113、13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200、21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
9.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价格理论》,蔡继明、苏俊霞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243页。
10.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美]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张琦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
11. [美]欧文·费雪:《货币的购买力(第一册)》,金本基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8~31页。
12. 彭新、彭丽:《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适用性研究》,《企业经济》2011年第7期。
13. 王东京:《经济学反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194页。
14. 徐海:《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实证分析》,《时代金融》2013年第3期。
15. 赵伟、萧月华、王宇雯:《探求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之谜——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07年第9期。
16. 张焕明:《1979年—2000年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3年第2期。
17. 郑挺国、王霞、苏娜:《通货膨胀实时预测及菲利普斯曲线的适用性》,《经济研究》2012年第3期。
18. Arthur, M., Okun, Potential GNP: Its Measurement and Significance, in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tatistics Section, Alexandria, VA: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62, pp. 98—103.
19. Paul, A. Samuelson & Robert M. Solow, Analytical Aspects of Anti-inflation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0, May, 1960.
20. W. Phillips,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25, No. 100, 1958, pp. 283—299.
21. George, A. Akerlof & William T Dickens & George L Perry, Near-Rational Wage and Price Setting and the Long-Run Phillips Curve, *Brookings Paper on Economy Activity*, Vol. 2000, No. 1.
22. Clark, & Laxton, & Rose, Asymmetry in the US Output-Inflation Nexus: Issues and Evidenc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1995, WP95/76, pp. 216—250.

Further Discussion of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A Doubt on Philips Curve

SANG Yu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100091)

Abstract: Facing downward pressure on economics, Chinese government puts forward that not only steady growth and employment promotion as a floor level must be held, but also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lation as a superior limit should be grasped.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control? Some scholars advocate that we should push up inflation for employment according to Phillips curve.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the Phillips curve proposed by Samuelson and Solow is invalid

in theory.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Phillips curv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wage and cost, cost and price, price and infl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theoretical errors of “Phillips curve” from three aspects and demonstrating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article states that China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and continue to implement prudent monetary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xpanding employment and guarding against inflation.

Keywords: Phillips Curve, Wage Rate, Inflation Rate, Unemployment Rate

JEL: E24, E31

责任编辑:原 宏

(上接第 110 页)

Measurement and Decomposition of the Promoting Factors on China's Rural Anti-Poverty Performance: 1978—2014 ——Based on the Five Phas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WANG Zengwen (NanJing University, 210093)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household survey and CHIPS, we measure, decompose, and test the promoting factor of rural anti-poverty's performance. We find that the rural poverty rate fell, which benefited from the reform of land policy of endogenous from 1978 to 1985, and from 1986 to 1993, China's rural poverty was still falling rapidly, where economic growth factor plays a leading role, but the marginal revenue was falling. Although rural areas had implemented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relief and social relief during 1994 and 2000, the poverty rate decline is not large, because negative effects from redistribution offset the contribution from economic growth. China's rural poverty is rising slightly during 2001 and 2014, where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 from economic growth is falling. Throughout the 30 years' strategy and path of anti-poverty, we find that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playing the dominant role, and as the rate of poverty and poverty gap rebound, the contribution from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in alleviating poverty will rise.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ural public products and public service to optimize the path and strategy of rural anti-poverty.

Keywords: Anti-Poverty, Pushing factors, Contribution Rate,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Reduction

JEL: I32, H41

责任编辑:汀 兰